

岁月里的母亲

刘静

“五一”返乡，在那熟悉的院落，母亲如月牙般的身影老远就映入眼帘——她微笑着，颤巍巍地招呼我们进屋。望着母亲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我想起她年轻时利落飒爽的模样，心酸与歉疚地涌上心头：母亲真的老了。

母亲没上过一天学，十九岁嫁到刘家时，家中一贫如洗。父亲当时父母双亡，带着年幼的叔叔和姑姑一起生活，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母亲嫁过来后，和父亲一起挣工分，她的贤淑和操持，让生活慢慢有了起色：将叔叔送去部队当兵后又为他娶了妻；为有眼疾的姑姑置办了嫁妆找了个踏实的人家；父亲担任了村支书。

眼看日子越过越红火，可天不遂人愿：搬新家后第二年，四岁的弟弟在家门口的水沟里玩耍时溺亡；第三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又夺去了父亲年仅三十六岁的生命。

噩耗传来，母亲晕倒在地，七天没有下床。当时姐姐和哥哥在读初中，我还在读小学。周围人都劝母亲：“三个伢子都读书，你一个妇道人家怎么供得起？老大人是个女娃，留在身边帮衬着也好。”母亲不说话，只是摇摇头。母亲硬撑着身体下了床，第一件事就是请来几位本家亲戚开了个家庭会议，并当众宣布：要送三个孩子继续读书。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她坚信“人从书里乖”，不能因为贫穷耽误了孩子们学道理、明事理。

母亲既做慈母又当严父，白天侍弄五六亩田地维持生计，晚上边操持家务，一边管教三个孩子。

每年七月的“双抢”是村里最忙碌的时节。哥哥姐姐放假后也加入了“双抢”大军。不到十岁的我在家里排行最小，母亲便不让我下地，安排我在家里负责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有一次在切南瓜时，我把左手大拇指砍掉了一截。家中无人，我只好学着大人的模样先用刀打止血，再跑到墟场药店做了个简单包扎，便继续回家切菜做饭。母亲下地回来发现后，心里又悔又急。她担心伤口感染，又怕大拇指愈合后会短一截。于是四处打听偏方，得知有个亲戚治病很灵验，便连夜带我赶过去，央求人家给我开了几副草药。一个月后，我的伤口果然长好了，母亲又专程带我去亲戚家感恩万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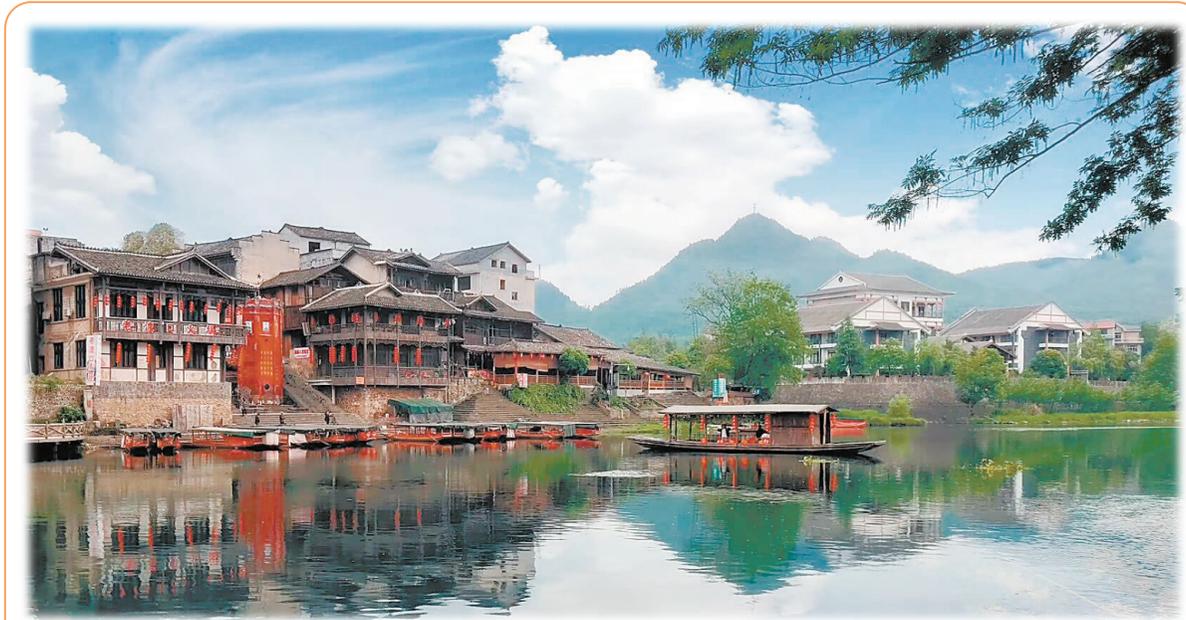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种田没有现在的补助，还需要交村留统筹费。母亲从地里刨出来的收入也仅够维持我们四口人的温饱，但再怎么窘迫，母亲也从未让我们拖欠过学费。但不能按时上缴留统筹费成了母亲最大的心病。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四，由于拖欠了村里的钱，村干部便搬走了父亲留下的仅有的贵重物品——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

捉襟见肘的生活迫使母亲不得不另寻出路。元宵节一过，母亲一狠心挑着担箩筐赶到县城做起了菜贩子。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独自在郊区租了间杂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着箩筐去批发市场批菜，再挑到北门菜市场零售，赚取微薄的利润。她不识字，却会看秤和算账，心算比谁都快。也正是这筒易的箩筐，让母亲看到了把三个子女送出农门的希望。

母亲在县城卖菜后，我们一般只能在农忙季节看到她。记得一个飘雪的冬日下午，我一放学回家就意外看见母亲已在家中。见我回来，她眼睛一亮，急忙拿出一双崭新的雨靴要我试大小。我满心雀跃，要知道对于当时读初一的我来说，拥有一双雨靴，是一个藏在心里不敢奢求的梦。母亲笑着说：“这几天菜价好，就收了个早工，去百货商店买了双鞋，这个冬天你的脚就不用再挨冻了。”

父亲走的那个冬天特别冷，灶膛里的火怎么都烧不旺。那微弱的火苗，在黑暗中瑟缩颤抖，一如母亲孤苦无依的心。但不管生活如何艰辛，这么多年来，母亲却从未退却。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忽然明白老舍先生这句话的深意，在岁月的长河中，母亲永远给予我最温暖的守候。



风光优美的边城。

通讯员 摄

水墨边城

董兴培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边城。

一直在想，该是怎样一方神奇的山水，才滋养出那纯净唯美的文字。

端午时节，我来到梦之所向的边城茶峒。天下着小雨，如黛的远山隐在薄雾中，有些自然的起伏，偶尔露出一段乳白的岩石，点缀着青翠。如一幅山水画，淡淡地散开，不经意的留白，透出墨的清香。

我们住在一个叫“小河湾”的客栈里。这是一座百年木屋，斗拱下的中堂悬挂着匾额“也许也许”。漆黑的木门，略高的门楣，白石磨垒的栅栏，青石铺的院子，多了几许怀旧。院中的一棵樟树，一片桃园和几处菜地，添了不少生机。恰如边城，一半的诗意，一半的烟火。

出客栈沿“从文渡”拾级而下，便是清水江。密密的细雨柔柔地地下着，江上有些朦胧。豆绿的江水缓缓地流，清澈却看不透。木船在静静地穿行，却听不见桨声。粗大的麻柳随意地斜倚在江边，有风吹过，垂下的柳枝轻轻拂动，江面上便有了一点涟漪。

满城烟雨中，我们随意地走着，寻觅各自心中那个渡口或者那座碾坊。江边的护栏每隔一段，便会有沈从文先生隽永的文字：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白底黑字，秀丽的行楷，如山里的泉水刚刚洗过，干净极了。依山而建的吊脚楼鳞次栉比，高高低低不甚整齐，但有其内在的

韵律，与这山水浑然一体。

“拉拉渡”旧址有些荒凉，只剩下青石和泥土，河对岸也多了些现代的建筑。《边城》里善良的老船夫和那些渡船的故事应该都尘封在这岸边的泥土里。风雨中，远处漫山的篁竹在风中摇曳。

小城街道不宽，宁静而悠长。客栈和店面很多，挂满了灯笼和油纸伞，夜里鹅黄的灯照着，青石有些湿滑，透出柔和的光。各式招牌井然有序，店里的人各自忙着，很少听见叫卖的声音。除了蒸腾着热气的美食，最多的店便是翠翠茶叶，银饰、苗绣、蜡染的服饰，手工编织的竹艺。不时遇见卖山货的村民，将豆角、竹笋等山货一字排开，蹲在地上悠然地吸着旱烟，眯着眼打量着过往的行人。卖麦芽糖的小贩戴着草帽，挑着竹箱，小锤敲打着铁片，“叮叮当”的声音格外清脆。

穿过一段不长的青石巷，便到了“沈从文故居”。吊脚楼式的房屋并不显眼，一口石缸、两盏宫灯衬出建筑的古朴。入口处摆放着小圆桌和一把藤椅，小圆桌铺了缀花的白色桌布。门扉上刻着《边城》的名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读着，忽然心头一颤。

旧居里陈列着沈从文先生的文稿、书信、陈年的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信笺有些发黄，先生的字极好，俊秀灵动。书房里放着一张旧式的书桌，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卧室不大，推开雕花的木窗，便可看见清水江，窗下不时有人经过。灶

间里有一口黄泥垒的火塘，三五棵松木弯成的小椅。青石铺成的小天井，四边的屋檐整齐地伸展着。想那阴雨绵绵的日子，雨水击打着瓦，顺着屋檐流进这方天井，一定会飞溅起一朵朵白亮的水花来。

远远地看见掩映在绿树中的白塔。五层白塔，六角飞檐，每一面都留着拱形的门，眺望着远处的天空。塔身洁白，有些纤秀。离塔不远，一座青瓦泥墙的小屋应该就是“翠翠屋”了。小路蜿蜒而上，被一丛丛竹林拥着。我知道那里曾住着翠翠和她须发花白的爷爷，一只大黄狗在欢快地跑动，还有种着葱和豌豆的菜园，一块可以晒日头纳凉月下听歌的大石板，四处盛开着不知名的野花。河的对岸，布满青苔的悬崖上，也一定长着一大片一大片圆形的虎耳草。

一条铁索系着江心的翠翠岛。“边城翠翠号”方头木船停在渡口，江水一下一下地轻抚着。乘上渡船，船工站在船头，用一只带四口的木器一下一下地拉着，船便缓缓地驶向对岸。铁索两边依旧挂着铜环，不时碰撞发出低沉的声音。岛上绿树成荫，洁白如玉的翠翠雕像，静静地伫立，粗长的辫子、温婉的神态、清明如水晶的眸子，手捧一把带着露珠的虎耳草，凝望着远方。

翠翠岛像一只渡船，孤独地泊着。一本倒扣的《边城》与天际融为一体，翻开的扉页上写着“时光之外，无边之城”。

作家写开福

甘草子

湘江流到开福区，步子就缓和多，像是被麻石街牵住了裤脚。这一句，就勾起些故事。如今的故事，大多窝藏在一个个小剧场里，像瓦檐下刚结的燕巢，旧梁上新长出的木耳。

开福有戏，是出名的戏窝子。潮宗街深处藏着湘剧老信周多的“戏痴”剧场。阁楼堆着三十口乌木戏箱，每口都贴满风干的戏单。

芙蓉北路旧机床厂厂房改的小剧场，去年翻修时掘出了半截石碑。青石上刻着“楚赵如薪”，挤满了清末戏班班主所留，如今石碑嵌在新砌的酒吧吧台里，调酒师往碑面摆柠檬片，威士忌的琥珀光晕开在“薪”字上，像给老魂灵点灯。

如果你被春晚的塑料普通话段子刷屏，一定会对徐浩伦、谭湘文不陌生。他们以长沙方言的

开福有戏

甘草子

魔性幽默和“骗”“假”不留”的表演征服全国观众，成为新晋喜剧顶流。而他们的“娘家”，就在笑嘛剧场。

笑嘛剧场是湖南首个脱口秀俱乐部，由一群喜欢脱口秀的青年组成。在本职工作之余，他们热衷于用语言把你逗笑。有思想有态度，不油腻不妥协，为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发声。每周四至周日都有即兴喜剧、脱口秀演出。

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我慕名前往。门帘刚掀起，便被哄堂大笑撞了个满怀，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场子，挤满了年轻的笑脸。台前悬着猩红幕布，台上立杆麦克风，几盏射灯把简单的台面照出几分神圣和庄严。

这些小剧场，不似国家大剧院的金碧辉煌，倒像菜农筐里沾泥的菌子——形态各异，气味生

芦花江水留绣郎

邓建华

我喜欢回靖港古镇看夜景，尤其是夏夜，七彩灯将芦花江染得绚丽，心就溶在柔波里了。

今夜，我却是为一个人而来。他叫蒋桐万，在靖港最有韵味的半边街口，开了一间“潇湘绣郎湘绣工作室”。

在古镇河街有意多转了一圈，我才去了绣坊。我怕去太早打扰到那个不一般的主人。

从许多熟悉他的口中，我知道他的不易。蒋桐万是永州人，1989年出生，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父母为了生活外出打工，他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这个性格有些孤僻的男孩子，从小就喜欢透过家乡的山水遥想远方的世界。腿脚不方便的他，却有灵巧的双手，有太多奇思妙想。2010年他报考了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湘绣设计与工业专业，很快他就迷上了湘绣，2013年毕业后拜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代表性传承人刘爱云为师，成为刘爱云大师“鬃毛针”技艺传承人之一。

人行十多年，蒋桐万潜心创作，70多幅亲手

创作的作品被爱好者珍藏。他参加过不少比赛获过不少奖，他带过不少学生讲过不少课，慢慢有了名气，一度被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他临摹黄永玉画创作的作品“荷花无数满汀洲”，据说连黄永玉大师本人也都点称好。

我尽管去得有点晚，但工作室展厅里，仍没见到蒋桐万。

听文联的同事说，他兼了省、市图书馆的湘绣课程老师，除了经常要去长沙授课，还要在网上讲课，向广大爱好者传授技艺。我估计，他应该是在里间上网课。我没有推中间那道门，怕打扰到他。倒是门店前垂柳下，一位打着赤膊晾凉的汉子，冲里间吆喝：“蒋老师，来客人了！”

里面马上有人应答。

这样，我们就推开门，却见蒋桐万满头大汗在吃晚饭。看见我来，他赶紧找抹布，艰难起身。

蒋桐万带着我，介绍起他的作品来。他说自己与湘绣的缘分，是湘绣给了他施展拳脚的空

作家写作家

“那年，‘八一’建军节快到了，小区内操坪，传来阵阵军号军歌声。我那同乡发小应征入伍，上南国战场，再没回来的故事，随着军号军歌跃然眼前……”

这是阿良先生说起他的短篇小说《糯米酒》时的感言。又逢建军节前夕，我重读阿良先生的《糯米酒》，感觉酒香远飘，让人心醉。

故事是这样的：三十五年前，儿子在那场自卫反击战中牺牲，闻信后，其父倒地身亡；其母一直生活在丧子失夫的悲伤中。幸赖儿子的未婚妻杏子几十年的照顾、精神安抚，母亲终于从悲痛中走出，决定自酿糯米酒，去南国看望儿子。一路上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也测试了这个社会的温度。

当时，正值湘潭市作协举办“宏大真空杯”读书征文，便想为《糯米酒》写点文字参赛。经过仔细品味，写下了《糯米酒》的语言艺术，阐述《糯米酒》这篇小小说，不论从叙事叙述、人物塑造，还是环境描绘、情思传达，都能艺术地溶解、融化到文字中去。

投稿参赛前，我把文章发给阿良先生过目。恰逢重阳节，我在微信转发文章时，附上了祝福语：主席先生，重阳节好，一篇小文，不成敬意。阿良先生回复了一个“致敬”的图片，也留言：彭楠是哪位老师？我给了一个“笑脸”，留言：彭楠是我的笔名，准备拿此文参加“宏大真空杯”征文。阿良先生回复：不好意思，让您费心了。我在江西吉安东固向您问好！原来，他为撰写长篇传记小说《黄公略——偏师虎将》，沿着当年黄公略将军的足迹，重走将军路，从湘乡、双峰至黄埔军校，已到了江西吉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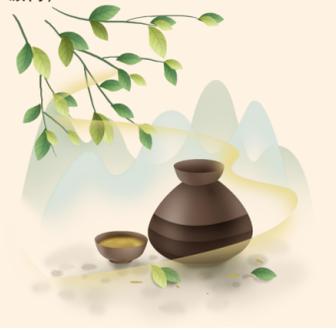
我的这篇文章，在征文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但评委得知作者“彭楠”是我笔名，而我是活动组织者之一，在平衡中把我这篇给退出了入围。说实话，我心里有些遗憾，因为我很想为阿良先生做点什么。一是他曾为我的小说集《丢失的“香柚”》写过序言，而我一直没能好好地感谢他。二是他当市作协主席的10年，做了许多“了不得”的大事，一直被传为美谈。比如自筹资金创办会刊《湘潭文学》，杂志为季刊，16开本，每期20万字左右，为广大会员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刊发作品的平台。为市作协争取了一定的文学奖励基金和协会活动经费，且进了市财政的“笼子”，让我格外尊敬。

好在收到的参赛文章中，评论阿良先生的有13篇之多，我心里稍安。他的长篇小说《红土地上的寻找》《芙蓉酒庄》、短篇小说集《远方有诗》、散文集《翻阅时光里的珍藏》等都有作者评论。

阿良先生找我索要那13篇参赛文章的资料信息，表示一方面要向作者致谢，另一方面要认真阅读，仔细揣摩，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我照做了。有一天，我收到阿良先生的微信：感谢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我的拙作《糯米酒》撰写评论，鞭策我，鼓励我。您是老师，给我的作业写了批语。我收集了，认真看。您的评论，有些分析比我想得还深入，是我改进的方向，也是我继续前行的营养。还有十来天就过年了，这里给您拜早年。春节快乐，万事顺意！

看着这段文字，我感慨不已。阿良只是笔名，真名是徐秋良，中国作协会员，湘潭市作协原主席。这么有成就的作家，依然如此看重大家的评论，从中汲取营养，他的《糯米酒》能够上国家级大刊，他的诸多作品能够被大刊名刊采用，就不奇怪了。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湘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秋良，笔名阿良，中国作协会员，湘潭市作家协会顾问）



「糯米酒」香飘悠远

刘纲要